

# 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sup>\*</sup>

## ——基于“国富”学说的考察

缪德刚

**内容提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理论研究中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工具,也是改进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17世纪末以后,随着以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方式的推广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思想陆续衍生出了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系列指标,“国富”便是其中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富”学说在中国传播后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关于“国富”的中文文献面世,其内容主要是介绍“国富”学说的内涵及价值、估算方法及统计项目等。“国富”学说的传播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统计在中国的发展,还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 “国富”学说 “国民所得” 统计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不仅是反映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基本工具。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历次发布均受到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看,不论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形成时期,还是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应用阶段,中外经济学者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研究。从相关成果来看,当前国内统计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集中于介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进趋势、回顾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对中国本土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探索等方面,<sup>①</sup>经济史学者则对中国历史上部分经济指标的估算与再估算有过颇多着力。<sup>②</sup>在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发展成现代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过程中,经济学界对相关问题有过难以计数的讨论与争论。<sup>③</sup>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期前,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20世纪中期现代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基本定型后,学界

[作者简介] 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ndg2016@126.com。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邹皓丹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延龙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苏于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朱清秀博士在日文、德文资料订正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第二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梁捷博士在“第一届云南大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青年学者论坛”上对本文的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 蒋萍、刘丹丹、王勇:《SNA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心框架、卫星账户和扩展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第3期;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李金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扩展与延伸——来自联合国三大核算体系比较研究的启示》,《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杜恂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刘逊:《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除了本文提到的学者外,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演进中做出贡献的学者还有莱特(Carroll Wright)、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米歇尔(Wesley Mitchell)、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斯通(Richard Stone)以及部分苏联经济学者等。也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规模进行了估算,如:1972年Alexander Eckstein、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分别对中国的国民经济数据进行了估算;20世纪80年代后,罗斯基(Thomas Rawski)、麦迪逊(Angus Maddison)等人对中国部分历史时期国民经济规模的估算成果受到学界关注。

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偏向于统计实践。近年来,虽然从经济学术史、经济思想史角度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sup>①</sup>但在廓清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发展脉络方面仍有探索的空间。<sup>②</sup>有鉴于此,在挖掘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比较研究方法对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发展历程中重要指标之一——“国富”学说的演进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爬梳,以期进一步充实该领域的相关研究。<sup>③</sup>

## 一、“国富”学说的演进

经济学者通过收集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方式滥觞于17世纪后期。1662年,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 1620—1674)因出版《根据死亡名单而作的自然和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 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被查理二世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方面产生更大影响的是John Graunt的好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1672年,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中利用统计方法比较分析了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评估了当时英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1695年,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出版了《论战争的供给方式》(An 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书中介绍了16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住宅的估算数量。该书对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 1648—1712)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696年,Gregory King的研究成果《英格兰自然及政治状况的观察与结论》(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England)披露了1688年英格兰部分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Charles Davenant和Gregory King在国民经济核算相关问题上的争论,不仅深化了二人在该领域的研究,而且使得运用经济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方式产生了更大影响。<sup>④</sup>后来,John Graunt、威廉·配第、Charles Davenant、Gregory King也被视为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先驱。<sup>⑤</sup>

17世纪末期,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统计方法在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应用。1688—1697年大同盟战争后,为了恢复经济,英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当时的经济形势。同时,优化征税制度也需要了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情况。由此,威廉三世的辅臣们仿效威廉·配第的研究方法估计本国的人口及“国富”。<sup>⑥</sup>“国富”即国家财富,是以货币价格衡量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或法人占有的物品与劳役的价值总计,而“人均国富”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单个公民可以满足自身生活水平的能力。19世纪后,“国富”学说随着社会经济统计的发展而演进。1834年,皇家统计学会于伦敦成立,并于同年对曼彻斯特地区的职业人口进行抽样调查。<sup>⑦</sup>19世纪后期,就职于

① 关永强:《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财经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重视国民经济核算学说发展史的研究,如邱东《国民经济核算史论》(《统计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除“国富”外,早期国民经济核算思想中另外一项重要统计指标是“国民所得”,即国民收入。

④ 虽然Gregory King的研究低估了家庭财富和非贫困人口数量,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论著中,仍在使用Gregory King的估算数据。G. S. Holmes, M. A. B. Litt and F. R. Hist. S., “Gregory King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re-Industrial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27, 1977, pp. 41—68.

⑤ 罗杰·E. 巴克豪斯著,莫竹苓、袁野译:《西方经济学说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页。

⑥ G. S. Holmes, M. A. B. Litt and F. R. Hist. S., “Gregory King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re-Industrial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27, 1977, pp. 41—68.

⑦ Clark Warburton, “Valu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Its Components, 1919—192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29, No. 188, 1934, pp. 383—388.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统计部门的蒂莫西·柯格兰(Timothy Coghlan, 1856—1926)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对新南威尔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统计。Timothy Coghlan 的研究工作一度被德、日、美、英等国借鉴,该时期的相关研究着眼于了解“国富”增长及收入分配状况,而非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指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国富”在经济分析中的价值。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国富”数据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并给予经济落后国家以科学化发展的建议。<sup>①</sup> 20 世纪初政治经济形势变动,“国富”研究受到了各国政府关注,相关成果也成为一些机构制定决策的重要参考。如赫尔斐利希(Karl Helfferich, 1872—1924)对德国“国富”的估计成果《德国的财富(1888—1913)》(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1888—1913)成为一战后协约国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的依据之一。<sup>②</sup> 1915 年,威利福德·金(Willford I. King, 1880—1962)对美国的国民财富及国民收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估算。<sup>③</sup>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衰落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愈加重视“国富”调查工作,并扩增了 1922 年设置的中央统计委员会<sup>④</sup>委员人数,并向该委员会提供专项调查经费。

17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经济学界一直视“国富”为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国富’和‘国民所得’概念的演变在经济思想史发展中一度占据了极其核心的角色”。<sup>⑤</sup>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批关于“国富”的中文著作陆续出现,其主要内容是展示部分国家的“国富”。<sup>⑥</sup> 20 世纪上半叶,一些外国学者及国外机构开始分别对中国“国富”进行估算。最早对中国“国富”进行估计的是日本学者高桥秀臣,他认为 1913—1914 年中国的“国富”数额为 106 133 百万日元。日本内阁统计局发布的《列国国势要览》中估算的 1922 年中国“国富”为 401 183 百万日元,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估算的 1926 年中国“国富”为 126 360 百万元,并根据“国民所得”占“国富”的比例推算得出了中国“国民所得”为 12 525 百万元,人均 29 元。英国的两位学者推算出 1927 年中国“国富”为 40 619 百万元。<sup>⑦</sup>

## 二、“国富”学说的内涵及其价值

### (一)“国富”学说的内涵

20 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世界各地传播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

① Milton Gilbert, Colin Clark, J. R. N. Stone, Francois Perroux, D. K. Lieu, Evelpides, Francois Divisia, Tinbergen, Kuznets, Smithies, Shirras and MacGregor,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alth: Discussion”, *Econometrica*, Vol. 17, 1949, pp. 255—272.

② 有泽广己著,何鼎译:《国民所得论》,《军需杂志》1935 年第 31 期。

③ 参见罗杰·E.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说史》,第 258 页。

④ 1881 年,日本太政官设置“统计院”。1885 年,日本废除“统计院”,设置“统计局”。1883 年,“统计局”划归内阁书记官室辖属的“统计课”。1898 年,“统计课”改为“内阁统计局”。1920 年,“内阁统计局”与军需局合并,内阁设置“国势院”,其中统计部门为“国势院第一部”,同年内阁设置“中央统计委员会”。1922 年,撤销“国势院”,“国势院第一部”成立“统计局”。1924 年,“统计局”改为“内阁统计局”。1937 年,撤销“中央统计委员会”。1942 年,“内阁统计局”改为“统计局”。1943 年,“统计局”改为“内阁统计局”。1984 年,总理府统计局的总务课、统计情报课、调查部各课及行政管理厅行政管理局统计主干部局合并为“总务厅统计局”。2001 年,总务厅、邮政省、自治省合并为“总务省”,下设“总务省统计局”。参见『日本統計年鑑』の歴史と年表」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https://www.stat.go.jp/data/nenkan/pdf/120ayumi.pdf>, 最近访问时间:2019 年 4 月 3 日。

⑤ Morris A. Copeland, “National Wealth and Income—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30, No. 190, 1935, pp. 377—386.

⑥ “国富”与“国民所得”中文文献相较而言,前者的出现时间更早。“国富”文献如《亚洲近事:日本国富概算表》,《知新报》1899 年第 85 期;《政治图表》(《英国国富表》),《政艺通报》第 2 卷第 18 期(1903 年);《丛钞:列国国富比较表》,《商务报》(北京)1904 年第 22 期。

⑦ 除了估算中国“国富”外,国外学者和机构还推算了中国的“国民所得”。有关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概貌可参见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 20 世纪 40 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邹进文《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因此,与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的概念也多转述自国外文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富”学说仍然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不同学者从各异的角度对“国富”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有学者认为,“国富”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以货币衡量的现存物质价值的总和。“因为现下是货币经济的时代,国富的计算,统统以货币价值来表示。不过货币本身的变动很大,价格的表示,终难衡量富力的价值,但是不用这(种方式),更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各国的国富调查,都以货币为计算之单位。”<sup>①</sup>显然,这是侧重于“国富”的衡量标准所界定的内涵。陈光照翻译的谢拉斯的著述中指出,“国富”是指一个国家内由居民个人或法人拥有的财产。“国富”包括本国居民个人或法人拥有的外国财产,但不包含外国居民个人或法人拥有的本国财产。“国富”不包括气候、瀑布、海洋生物等,也不包括“活资本”和“活劳动”。<sup>②</sup>虽然谢拉斯的界定囊括了“国富”涵盖的范围,但实际上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学界对“国富”内涵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如有观点认为,“国富”与私人财富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有功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私人财富才是“国富”。<sup>③</sup>

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如果生产等于消费,那么其“国富”没有增加。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如果生产大于消费,资本得到积累,“国富”也随之增加。反之,如果生产小于消费,资本得到削减,“国富”也随之降低。“国富”与“国民所得”不同,“国富”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有的资产价值,“国民所得”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一年为单位)一个国家生产的货物与劳役的净值总和。<sup>④</sup>“国民所得”不仅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还能从中获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sup>⑤</sup>

## (二)“国富”的研究价值

估算“国富”的现实意义在于:(1)评估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是否取得了经济进步;(2)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繁荣程度;(3)比较“国富”与“国民所得”的差异;(4)便于征收资本税,调整税收结构;(5)修正战后经济赔款数额。<sup>⑥</sup>此外,“国富”的增加有助于保障国家军事实力。<sup>⑦</sup>

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中国学者关注“国富”问题的目的之一是解释欧美日等国家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并寻求增加中国“国富”的途径。中国国土较英国广阔,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低于英国,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愈之认为,这是因为英国不仅采用了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而且一战之后英国采用新式生产设备发展工业。<sup>⑧</sup>明治维新后,日本将工业和农业并举,使其经济实力虽不能和欧美国家相提并论,但在远东国家中独树一帜。<sup>⑨</sup>吉人认为,美国“国富”增长与汽车运输有一定的关系。<sup>⑩</sup>有学者将19世纪末美国经济超越英国的原因归结为美国工业规模强大、劳动者技术熟练、煤炭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sup>⑪</sup>冯肇樑将中国“国富”比日本低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落后、缺少大资本家、财政紊乱等因素。<sup>⑫</sup>

寻找制约中国“国富”增长的因素是近代中国学者关注“国富”问题目的之二。乔治将中国“国

① 鸣陆:《什么是国富》,《民众周刊(济南)》第4卷第43期(1932年)。

② “活资本”指营运资本,“活劳动”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过程。G. F. Shirras,陈光照译:《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年第131—132号,即G. Findlay Shirras,“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alth”,*Econometrica*, Vol. 17, 1949, pp. 247—254.

③ 洪:《民财与国富》,《经济周报》第3卷第18期(1946年)。

④ 庄德金:《国民所得与经济恐慌》,《商学研究》(上海)1947年复刊第2期。

⑤ 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⑥ G. F. Shirras,陈光照译:《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年第131—132号。

⑦ 不严:《中国国军和国富之世界的比较》,《青旗》1929年第2期。

⑧ 愈之:《英美国富之比较及战后英国实业之称霸》(节译自英国《十九世纪及其后》),《东方杂志》第14卷第10号(1917年)。

⑨ 时达:《可注意之日本国富部分》,《晨光》(杭州)第2卷第14期(1933年)。

⑩ 吉人:《汽车运输为国富之源》,《商业杂志》(上海1926)第5卷第2期(1930年)。

⑪ 《实业:应用理学与国富之消长》,《大陆》(上海1902)第2卷第10期(1904年)。

⑫ 冯肇樑:《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国富之调查》,《钱业月报》第7卷第8期(1927年)。

富”贫穷的原因归结于“大家庭制”，“大家庭”中的非劳动人口直接影响了“国富”的生产，“大家庭”思想使得劳动人口不愿独自谋生，造成了家庭经济负担过重。<sup>①</sup> 张其昀认为，中国的贫穷是由耕地少、工业及交通不发达、教育落后导致的。<sup>②</sup> 曾铁忱认为，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甚至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私人资本无法积累，由此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曾氏指出，增加国家和公民财富来源的方法是：发展国家资本，经营国有的工商企业；私人不能参与的产业，由政府办理；重要产业避免被外资操纵；政府需接力筹备垦荒造林事业，开发财富来源。<sup>③</sup> 也有学者认为，增加“国富”的方法是节制享乐，投资房产、土地、工厂，购买保险券、储备券并以其账户存入银行。<sup>④</sup>

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判断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性成为了中国学者关注“国富”的重要原因。如 1940 年香港《星报》的社评认为，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从日本的“国富”来看，军需物资已经消耗了其“国富”的 36%，因此日本必然战败。<sup>⑤</sup>

### 三、估算“国富”的热点问题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学者关注的估算“国富”方面的热点问题包括估计方法、统计项目以及基于“国富”数据分析等方面。相关著述主要是通过介绍当时国外的“国富”估计方法、统计项目、估算成果等方式呈现。

#### （一）“国富”的估计方法

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例，该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驻单位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国内生产总值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总和，也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各项收入之和。同时，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其对应的核算方法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且三种核算方法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额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sup>⑥</sup>

不同的经济指标之间有理论上的密切联系，也有各异的统计方法。与“国富”有较大关联的经济指标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指标，由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企业间接税得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类似，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归纳为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国富”根据国家财富的来源估算，而“国富”的估计方法与其来源密不可分。邹豹君将“国富”的来源分为天然物品和人为物品两类。天然的“国富”来源包括金、银、铜、铁等金属，以及煤炭、石油等非金属。天然的“国富”来源是地质构造形成的。人为的“国富”来源有如稻、麦、棉、丝等农作物。人为的“国富”来源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sup>⑦</sup>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早期，估算“国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向财产所有人分发调查问卷，从而将获得的财产数额合计；二是将调查的财产制作成目录，然后参考相应物价进行合计。20 世纪 30 年代前，通过全区域实地调研来统计“国富”的国家较少，且其调查方法各异。1915 年，澳洲因战

① 乔治：《大家庭制与我国国富问题》，《妇女杂志》（上海）第 13 卷第 1 期（1927 年）。

② 张其昀：《中国国富概况与国际关系》，《地理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

③ 曾铁忱：《中国经济富力与救贫问题》，《社会月刊》（天津）第 1 卷第 2 期（1929 年）。

④ G. F. Shirras, 陈光照译：《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 年第 131—132 号。

⑤ 《日本国富的消耗》（社评），《大美周报》1940 年 4 月 7 日，第 10 版。

⑥ 生产法是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全部最终生产成果的一种核算方法，即是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核算期内生产的总产品价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增加值。收入法是从形成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反映最终生产成果的一种核算方法，其增加值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相加而得到。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去向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核算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

⑦ 邹豹君：《国民对于国富应有的基本认识》，《地理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4 年）。

时所需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 18 岁以上个人所有财产及各类法人所属财产。<sup>①</sup>

表 1 1915 年澳洲《“国富”及“所得”卡》

一、姓名	
二、住址	
三、有无汽车	数量、种类、马力、使用目的
四、所得 (截至 1915 年 6 月 30 日,一年间)	积极所得 包括:1. 俸给及工资;2. 经营所得;3. 报酬及佣金;4. 福利金、年金、退休金;5. 雇主发放的住宿费、伙食费及其他;6. 房租、地租;7. 利息及红利;8. 年赋金、特权使用费、特许费及其他;9. 信托财产受益所得;10. 其他所得;11. 居住、娱乐所用土地及改良资本价格的半数
	消极所得 包括:1. 年度支出额;2. 借款利息;3. 修理费及维持费;4. 保险费;5. 年金蓄积;6. 非居住、娱乐土地缴纳的地租、房租;7. 税费
	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差额
五、财产 (截至 1915 年 6 月 30 日)	积极财产 包括:1. 手存现金额;2. 活期存款额;3. 定期存款额;4. 公债、股票及公司债;5. 债权;6. 手存商品价额;7. 家畜、家禽价额;8. 工场及相关设备;9. 营业家具;10. 招牌费;11. 含改良费的土地价额、不含改良费的土地价额、共有土地的股份;12. 私有土地的借地权、国有土地的借地权;13. 公共事业的纯财产及所有股份;14. 家具及其他非营业设备;15. 除保险证券外的其他财产
	消极财产 包括:1. 活期欠款;2. 不含土地担保的负债;3. 土地担保借款
	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的差额
六、其他财产	马、牛及其他家畜

资料来源:朱爱庐:《国富及国民所得之推计方法(待续)》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由于通过全域调研方法耗费巨大,在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早期通常采取已有材料推算“国富”。如美国分别在 1850 年、1860 年、1870 年和 1880 年主要依据既存资料对其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调查。

利用租税估算“国富”是常见的方法。该方法具体来说分为财产税统计和遗产税统计两种。前者是依据不同财产的课税额度,推算出相关财产的实际价值,加上免税财产及非课税财产后,得到“国富”总额。尽管如此,其结果也只能部分地反映“国富”,因为部分私人财富因顾忌征税而可能瞒报。<sup>②</sup> 利用租税估算“国富”通行于具备财产税制度的国家,如赫尔斐利希对德国“国富”的估算就是采用了此方法。由于漏税等问题的存在,利用租税估算“国富”最多能算出“国富”的 60%,其余部分“国富”仍需要用其他方法推定。

利用遗产税统计“国富”的方法是,在征收遗产税之前需要先统计继承的财产额,然后进行征税,在推算出财产总额的基础上进而估算“国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用遗产税统计“国富”实际上是财产税统计“国富”的一种方法。在 1894 年实行遗产税制度前,英国通过所得税统计资料還元资本量后计算“国富”。至 20 世纪早期,大多数国家没有实行财产税制度,所以利用遗产税估计“国富”更为普及。<sup>③</sup> 到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所得税资料還元资本量来推计“国富”成为当时使用最多的方法。<sup>④</sup> 按照所得税還元资本时,不同的财产种类有不同的還元率。除了使用所得税资料外,必要时还

① 朱爱庐:《国富及国民所得之推计方法(待续)》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② 鸣陆:《什么是国富》,《民众周刊》(济南)第 4 卷第 43 期(1932 年)。  
③ 朱爱庐:《国富及国民所得之推计方法(待续)》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④ Bernard Mallet, “A Method of Estimating Capital Wealth from the Estate Duty Statistic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71, No. 1, 1908, pp. 65 – 101.

需要利用财产目录式推计法进行实地调查。<sup>①</sup>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国富”有了较为通用的估计方法,包括所得法、遗产法、盘存法、普查法。所得法是根据每年个人或法人的实际所得计算“国富”,由于英国所得税统计资料齐备,故而所得法长期被英国采用。遗产法是根据遗产税或一年之内由继承人所继承遗产占社会全部财富的比例估算“国富”,遗产法常用于法国、新西兰。盘存法是综合各种财富,如土地、房屋、农产、各种机器、工厂、矿场、船舶、运输设备等求总额,盘存法流行于美国、加拿大、澳洲。普查法由个人填报财富和所得汇总而得到“国富”,该方法曾被用于战前德国国情调查。<sup>②</sup>

(二)“国富”的统计项目

当前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资料主要包含国内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及国际收支平衡表等。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不同产业部门的特点和资料来源情况,分别采用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标准数据,然后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得到。投入产出表又称部门联系平衡表或产业关联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1997 年投入产出表为 124 个部门,包括:农业 5 个部门;工业 84 个部门(采掘业 8 个部门、制造业 72 个部门、废品废料 1 个部门、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 3 个部门);建筑业 1 个部门;运输业由于按物质和非物质分组共有 10 个部门;仓储业 1 个部门;邮电业 2 个部门;商业、饮食业 2 个部门,其他服务业 19 个部门。资金流量表根据参与资金活动的主体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一般政府、住户和国外五个部门。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料主要来源于各个专业部委的有关业务统计。<sup>③</sup> 20 世纪 40 年代,巫宝三提出了需要核算“国民所得”的统计项目核算原则,并将其分为农业、矿冶业、制造业、营造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住宅、自由职业、公共行政、国际收支等 11 个统计项目。<sup>④</sup>

“国富”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前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其统计项目的设置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近代学者鸣陆认为,各国“国富”调查项目根据本国国情设置,各国的“国富”统计以客观的方法为主。以美、日两国的“国富”统计目录来看,统计项目差别较大。同时,鸣陆指出,在“国富”统计目录中,“土地”的财富水平与其使用价值密切相关,土地使用价值越大则其价格越高。随着社会发展,“建筑物”在财富水平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产品及商品”减去输出品并加上输入品后才是其真实的财富水平。“通货”中不包括纸币但包含金银,因为金银可以从国外购买实物。本国国债中债权属于过外国人的不能计入“国富”,债权归本国政府和居民所有的外国公债则可以计入“国富”。<sup>⑤</sup>

表 2 美国“国富”统计项目<sup>⑥</sup>

不动产、家畜	器具、农业器械	工业器具及机械	金银货币及生金银
铁路及附属用具	市街铁路及电报、电话等设备	船舶运河及排水设备	水道及电力设备
衣服及修饰品	农产物、工业品矿物及输入品	家具、车及类似财产	

资料来源:鸣陆:《什么是国富》,《民众周刊(济南)》第 4 卷第 43 期(1932 年)。

① 财产目录式推计法(Inventory Method of Estimation)是将构成“国富”的物品按照种类或用途列明后,再结合其价格推计“国富”。朱爱庐:《国富及国民所得之推计方法(二)》第 1 卷第 5 期(1937 年)。

② 在估算 1944—1945 年英国“国富”过程中,从公私财产总和减去外国人资本,再减去国债及地方公债而得到“国富”。关于国债如何处理是当时的争议问题,因为国债属于私人财富,但从国家角度讲,国债并非财富。G. F. Shirras 著,陈光照译:《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 年第 131—132 号。

③ 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 stats. gov. cn/yearbook/ml/cc. htm,最近访问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

④ 缪德刚:《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 20 世纪 40 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⑤ 鸣陆:《什么是国富》,《民众周刊(济南)》第 4 卷第 43 期(1932 年)。

⑥ “富力”是近代“国富”文献中的常见词汇,“富力”衡量单项调查项目财富水平指标,一个国家“富力”的总和为“国富”。

表 3 日本“国富”统计项目

土地	矿山	海湖及港湾	树木
建筑物	家具及家财	制造工业机械	家畜及家禽
铁路、公路	车	船舶	水道
桥梁	输入品	货币及金银	各部财产
商品:(1)农产品;(2)林产品;(3)工产品;(4)矿产品;(5)水产品			
其他			

资料来源:鸣陆:《什么是国富》,《民众周刊(济南)》第 4 卷第 43 期(1932 年)。

澳洲和美、日等国“国富”统计目录项目的不同,部分地代表了当时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国富”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性框架。从统计项目来看,甚至可以说,“国富”作为 17 世纪以后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其统计项目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古典政治经济学色彩,但又不拘泥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来源的认识。

从二战后英国对“国富”的估算项目来看,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概念性的理论框架仍在发展,但“国富”统计方式较之前具备了一定的通用性。

表 4 英国“国富”统计项目

一、不动产	土地
	房屋及其他建筑物
二、农民资本	
三、工业、运输业、商业及金融业资本	估计利润之股票交换价值
	零售分配表
	金融、自由职业及其他利润
四、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之铁道	
五、利息	英国及英领各地与外国证券
	其他领地及国外证券所有权
	未征所得税之储蓄证券价值
六、未明价值、损失及逃避	
七、免付所得税集团之资本	
八、不产生所得之动产——家具、汽车、无线电、艺术品、金银器具等	
九、政府及地方之财产	
	总计
	减外籍人民所有之资本
	总国富
	减债款成本
	净国富

资料来源:C. F. Shirras 著,陈光照译:《国富之测算》,《统计月报》1948 年第 131—132 号。

(三)“国富”数据的应用

随着国外学者及机构的“国富”估算数据陆续发布,这些数据成为当时学界剖析社会问题、判断经济形势常见的分析工具之一。<sup>①</sup> 如高桥秀臣和美国纽约国民银行的估算成果发布后,部分学者不

① 如《列国国富比较表》,《商务报》(北京)1904 年第 22 期;《各国国富一斑》,《法政杂志》(上海)第 2 卷第 7 期(1913 年),第 93 页;《世界七大国最近国富比较》,《银行月刊》第 8 卷第 11 号(1928 年);《各国国富统计》,《前方周报》1939 年第 7 期。



仅使用这些数据横向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国富”，也运用其剖析了个别国家的经济结构。20 世纪初期，尽管已经发表的部分“国富”数据在当时被认为具备了详细的估算证据，但由于采用的方法、材料及币制计量单位不同，导致了即使是相近年份的“国富”数据也差距较大。如从图 1、图 2 两组数据的折算比率来看，高桥秀臣对 1913—1914 年部分国家的“国富”估计值和美国纽约国民银行对 1912 年估算的相应国家的“国富”数值并不完全相符。<sup>①</sup> 然而值得肯定的是，从这些估算数据中可以大致了解当时部分经济大国的在世界上的“国富”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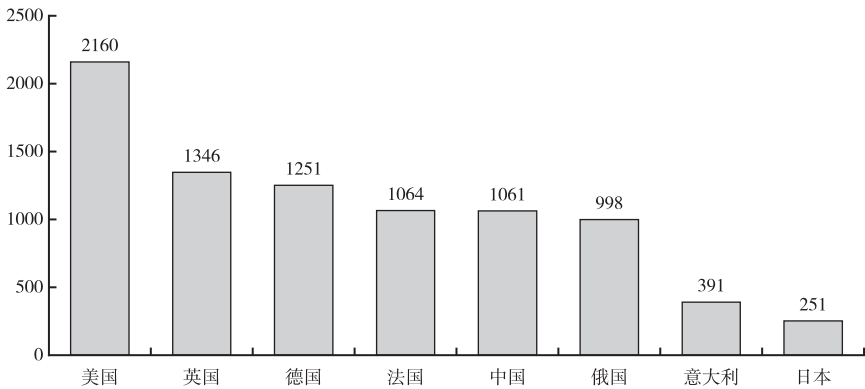


图 1 高桥秀臣推算的 1913—1914 部分国家“国富”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富力比较》，《宪法新闻》1913 年第 17 期。  
说明：图中单位为亿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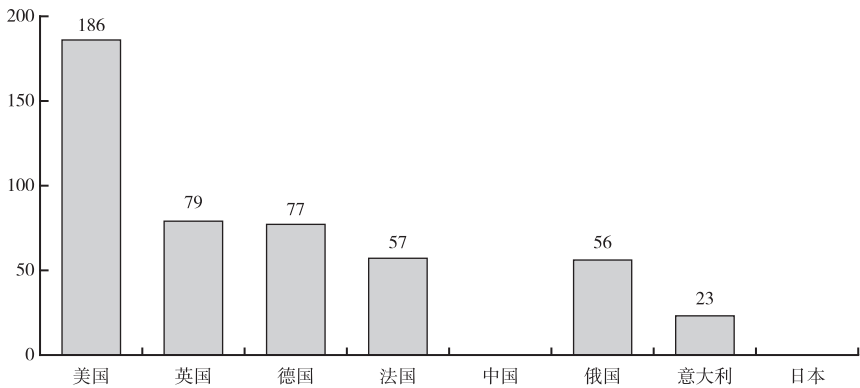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纽约国民银行估算的 1912 年部分国家“国富”

数据来源：叔奎：《美国经济现状》，《总商会月报》第 5 卷第 12 号（1925 年）。  
说明：图中单位为百万美元。

“国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在 20 世纪前期世界政治格局较为动荡的背景下，不少研究基于相关数据在进行国别比较的基础上解释了“国富”与战争的关系。<sup>②</sup> 有学者剖析了部分国家的“国富”结构或变化。如裕孙指出，从中央商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建筑物、

① 高桥秀臣估算了 1913—1914 年美、英、德、法、中、俄、意、日等国的“国富”数值，美国纽约国民银行估算了 1912 年美、英、法、德、意、西班牙、瑞士、俄、波兰、芬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印度等国的“国富”数值。理论上来说，在社会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果同一国家相近年份的两组“国富”数据的比值与其他国家比值大致相等，则说明两组数据差异较小；反之，则说明差异较大。另外，美国纽约国民银行未对 1912 年中国、日本的“国富”进行估算，为便于与图 1 比对，图 2 在图 1 的相应位置列出了中国和日本。

② 马寅初：《国富与未来大战之关系》，《每周评论》1934 年第 143 期；时达：《可注意之日本国富部分》，《晨光》（杭州）第 2 卷第 14 期（1933 年）；于锡来译：《海权与国富》，《建国月刊》第 3 卷第 2 期（1930 年）。

动产是构成1912年美国“国富”的三个要素。<sup>①</sup>有研究对不同时段个别国家的“国富”进行了纵向比较。<sup>②</sup>还有研究依据“国民所得”占“国富”的比例估算“国民所得”和“个人所得”。<sup>③</sup>

#### 四、“国富”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国富”曾是20世纪中期以前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而经济学说中对“国富”的关注源于如何增加国家财富、改善国民生活的政治需求。相较于其他国民经济指标,“国富”学说的演进更能体现经济学说史中对“财富”认识的演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富”学说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翻译或著述了相当数量的“国富”文献。相较于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刘大钧、程孝刚等学者在“国民所得”理论和估算方面的建树,中国学者对“国富”学说的关注可以说是“述而不作”。从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文文献内容来看,传入中国的“国富”学说是零散的,这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国富”学说仍未形成体系,该学说的理论框架尚待进一步完善。实际上,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国内外经济学者仍未对“国富”的定义做出学理上的界定。<sup>④</sup>

作为一项反映社会经济状况的经济指标,“国富”不仅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源头之一,也是近代时期传入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前,关于“国富”的统计方法、统计范围、统计项目等问题的讨论与实践为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愈发重视通过调研或资料获得经济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研究得到了空前发展。1921年,曾鲲化等人筹建了中华统计学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平设立社会调查部,“……国民生计问题,颇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为谋了解此种问题起见,公平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实为一急不容缓之事。董事会有鉴于此,爰特设立社会调查部,旨在探溯社会问题之根源,参诸外国之先例,聘请海内专攻社会经济学科之人士,俾获用其所学,从事科学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一面并刊行各种出版物,以为吾国解决社会问题之基础”。<sup>⑤</sup>1929年,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sup>⑥</sup>1930年,中国统计学社成立。中国统计学社成立后,参照国外人口普查方法,为国民政府的户口普查提供实施方案。特别是随着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国统计学社进行了大量的统计调查。此外,中国统计学社还编辑了统计刊物,向社会普及统计知识。<sup>⑦</sup>

以“国富”学说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近代中国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国富”学说相关的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中财富来源的认识,一些中国学者在梳理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论断。15—17世纪,重商主义者认为,贵金属是“国富”。在重商主义流行的年代,威廉·配第认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诞生于18世纪中期的重农学派认为,对外贸易从国外输入黄金、白银的政策不一定能增加国家财富、改善国民生活。重农学派将农业视为“国富”的源泉,只有农业生产才能产出净产品,净产品关系到“国富”多少。亚当·斯密认为,“国富”的来源不是某个产业或某个生产部门,而是获得生活必须物品的实际人类活

① 裕孙:《美国国富之一解剖》,《银行周报》第10卷第27期(1926年)。

② 《欧战前后日本国富比较表》,《银行周报》第6卷第16期(1922年);叔奎:《美国经济现状》,《总商会月报》第5卷第12号(1925年)。

③ 德累斯登银行依据1926年中国“国富”推算了“国民所得”。依据“国富”数额推算“个人所得”的成果,如《世界各国富力比较》,《宪法新闻》1913年第17期。

④ G. Findlay Shirras,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alth”, *Econometrica*, Vol. 17, 1949, pp. 247–254.

⑤ 《教育界消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报告》,《教育杂志》第19卷第10期(1927年)。

⑥ 社会调查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

⑦ 刘杰:《学术社团与知识建构——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统计学社》,《统计研究》2017年第4期。

动。对此,徐志明认为,“国富”的来源并非重商主义提倡的对外贸易,也不是重农学派秉持的土地农业,更不是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而是来自于综合发挥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力。<sup>①</sup> 成信指出,亚当·斯密虽然认可重农主义者的经济自由主张,但对重农学派认为的农业是一国财富或所得的唯一来源的说法持否定观点。此外,通过对“国富”了解,近代中国的学者对完全属于“舶来品”的经济学学科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如成信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让国民和国家变得富裕。<sup>②</sup>

20 世纪 40 年代后,伴随着物价的波动、<sup>③</sup>统计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逐渐确立,“国富”不再作为评估社会经济状况的统计指标出现,围绕估算“国富”的相关讨论也基本退出了中外经济学界的理论视野。虽然如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国富”学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国富”学说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国富”内涵以及甄别史料中“国富”与其他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差异具有参考价值。从经济思想史方面来说,建构在对财富来源认识基础上的“国富”学说不单是西方经济学说演进的关键线索,也是廓清国民经济核算思想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抓手。

##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Theory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Wealth

*Miao Degang*

**Abstract:** Economic data is a basic tool to explain economic phenomena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ies. After the 17th centur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problems, a series of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economic situation had been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 wealth among them. The theory of national wealth had attracted the common attention after it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literatures about the theory of national wealth had been published, which mainly introduced the connotation national wealth theory, its estimation methods and statistical item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wealth theory not only promoted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methods in China, but also makes Chinese scholar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theory.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National Wealth,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al Methods

(责任编辑:黄英伟)

① 徐志明:《论国富及其来源》,《新政治》第7卷第2期(1943年)。

② 成信:《斯密司的“国富论”》,《青年进步》1929年第119期。

③ Milton Gilbert, Colin Clark, J. R. N. Stone, Francois Perroux, D. K. Lieu, Evelpides, Francois Divisia, Tinbergen, Kuznets, Smithies, Shirras and MacGregor,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alth: Discussion”, *Econometrica*, Vol. 17, 1949, pp. 255 – 272.